

后冷战时代的中国外交

China's Diplomacy in the Post Cold War Years

牛军 / 主编

世界政治研究丛书
SERIES OF WORLD POLITICS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后冷战时代的中国外交

China's Diplomacy in the Post Cold War Years

牛军 /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世界政治研究丛书

SERIES OF WORLD POLITIC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后冷战时代的中国外交/牛军主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3
(世界政治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301 - 14956 - 0

I. 后… II. 牛… III. 外交史 - 中国 IV. D8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20641 号

书 名: 后冷战时代的中国外交

著作责任者: 牛 军 主编

责任编辑: 张盈盈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301 - 14956 - 0/D · 2250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ss@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3121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 毫米 × 980 毫米 16 开本 26.25 印张 385 千字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8.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 - 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序 言

这是一部关于后冷战时代的中国外交的历史著作。冷战结束后的一个历史时期被称为“后冷战时代”，一方面是因为世界政治因为冷战的结束而出现了许多新的特征；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一个相当简单的事实，即后冷战时代是与冷战在时间上相连接的一个时期，由此决定了它的基本特征几乎都是与冷战时期的世界政治相联系的，并且是同冷战相比较而显现出它们的特殊之处的。后冷战时期的中国外交同样如此。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历经五十多年，其中有大约四十余年的时间是在冷战中，即从1949年建国到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中国外交在这个时期受到冷战的极大影响，这是不争的事实，中国外交与冷战的关系是研究那段时期中国对外关系演变的一个重要视角。在展开后冷战时代中国外交的画面时，大致回顾冷战时代的中国外交是不可缺少的一步。

对冷战时期的中国外交的研究成果为数不少,除了一些比较深入的专题研究外,大量的内容反映在教科书中,且多为描述这个时期中国外交各方面的发展和一些重大事件的发展过程。这些描述因比较系统和全面而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本书的第一章相当全面地阐述了近代以来中国外交,其中包括对冷战时期的中国外交作了相当深入的分析。其他各章也几乎都详略不同地回顾了与之相关的历史。所以,在这里只提纲挈领地谈两个问题:其一是简要地说明中国对外关系的一个核心的问题和基本线索;其二是 对 20 世纪 80 年代的中国外交作概括性的论述。它们可作为全书的一个补充,并帮助理解和把握全书的基本内容和线索。

如果将冷战时期的中国外交与后冷战时代的中国外交进行比较,可以看到各种因素纷繁复杂、林林总总,其中一个核心的问题是中国如何处理与现存国际体系的关系。冷战结束后一个时期以来,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可以不夸张地说,上溯自 1840 年鸦片战争至今一百六十多年来,中国人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回答和实践,从根本上决定着中国外交的走向和成败。当然也是由于中国与外部世界正在形成越来越密切的关系,同时也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难和麻烦,中国人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和谈论中国与现存国际体系的关系。这个问题也就是这部著作中贯穿始终的线索。

从学术史的角度看,中国与现存国际体系的关系这一命题的提出,最初是由思考和应付冷战后的中美关系引起的。20 世纪 90 年代中美关系的曲折发展表明,影响中美关系的最深层因素,是中国与当今国际体系的关系问题,这是由冷战后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基本特征、中美在其中的地位以及中国所处的历史进程所决定的。当然,从中国外交的角度看,中国与现存国际体系的关系远不是中美关系可以涵盖的,其内容要丰富得多,也复杂得多。

五十多年来影响中国处理与现存国际体系的关系的主要因素来自内外两个方面的原因。外部原因主要与现存国际体系的一些主要特征联系在一起,即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其中占主导地位,这个体系的主要规则是由它们主导制订的,当然也就更符合它们的利益,而且一些规则还在按照它们的愿望修改或调整。另一个更为深刻一些的

因素,是中国发展道路的选择。冷战时期,世界上存在两大阵营,也可以说有两大国际体系。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时选择了苏联模式的发展道路,这决定了它当时主动加入到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际体系之中,成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一员。

导致中苏同盟破裂和中国脱离苏联阵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关键的因素是斯大林去世后,中国不能再容忍这个体系中苏联与其他国家那种“父子”、“猫鼠”式的“不平等关系”,以及在赫鲁晓夫试图对苏联的政治经济体制进行有限的改革时,中国的发展道路却在向相反的方向延伸。

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决定打开对美关系,主要是因为安全战略的需要。但是,发展与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关系与当时中国国内极端“左”倾的政策极不协调,这其实是制约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使谈判长达多年的主要因素之一。而恰恰是对这一问题的忽视或研究的缺乏,给相当多的中国人造成这样一种看法,即只要在战略安全方面有共同的利益,就足以维系与美国的关系。但事实是,共同的战略利益只不过促成了中美关系的缓和,而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却是与中国决定改革开放直接联系在一起,即使在时间上也是完全同步的。

以中美关系正常化为标志,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安全战略和外交战略,实际上完成了一次历史性的协调,这一过程的出现是以国家发展道路的转变为基础和主要动力的,它为中国同现存国际体系建立积极和日益密切的关系,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开拓了广阔的空间。历史的进程表明,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家发展道路固然给中国发展与现存国际体系的关系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也构成了中国可以被接纳加入其中的基本根据。迄今为止,当中国表示要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时,实际上表明中国已经将自己视为国际体系中的国家,并将维护现存国际体系(当然也包括像所有大国一样不断对其进行必不可少的改革)视为自己的责任,认为这关系到自己的战略利益。

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即开始并决定了以后四十多年世界政治基本特征的冷战,以苏联阵营的突然崩溃而告结束。从此世界进入了所谓的“后

冷战时代”。

冷战的结束是极富戏剧性的。没有人预料到冷战会以如此突然的方式迅速结束,其突然的程度使一些国家直到今天还在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处理为了应付那个时代被想象出来的各种军事冲突而制造的大量核武器和常规武器。同样没有人预料到,苏联这样一个称雄一时的超级大国,会在顷刻之间土崩瓦解,如一棵参天大树轰然倒地,至今尘埃仍未完全落定。在那段时期中,还发生了无数人们未曾预料到的重大事件,其频率之高也是少见的。在当时几乎所有堪称重大的事态中,不少人(他们中有不少甚至曾经预言中国不久将步苏联的后尘)也没有预料到,同样是社会主义的中国,仍然能够以比较从容稳定的外交姿态,应付天翻地覆般变化的世界大变局,并安然度过那段相当困难的时期,甚至在外交领域还取得了不少的成就。

中国外交能够稳定地过渡到后冷战时代,并迅速获得新的巨大的发展,主要取决于中国决策层当时制定的内外政策,正是他们使得中国能够处于一种相对超然的国际地位。如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政策发展的许多阶段一样,这一时期主导中国对外政策的主要因素是国内政治的变化,即中共中央重新确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和国家发展战略,导致中国对外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80年代中国外交在改革开放政策的影响下,进入一个新的全面发展时期。一方面是中国越来越深入和全面地与世界各国和国际社会交往,其表现是中国对国际事务所包括的各个领域的全面参与和越来越多的合作。另一方面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在逐步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种变化是中国外交发展的深层原因和主要动力。

中国在80年代形成的一些重大外交决策不仅直接影响了这个阶段的中国外交,而且包含了中国应对冷战结束后急剧变化的国际环境的基本思路和方式,后冷战时代中国外交的基调基本上是在这个阶段确定的。邓小平在冷战结束前后提出的“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以及“韬光养晦”等方针,无不是源于80年代中国对外政策的演变及其指导思想的发展。当时中国外交的主要特征表明,80年代末期中国已经大致形成了可以超然于冷战的外交态势,无论是从中国外交指导思想

的本质,还是从中国对外关系的状态的角度看,都是如此。甚至可以做这样的合理推论,即使冷战不像后来那样突然结束,中国也不再可能,更重要的是不会再有任何意愿,继续在美苏的角逐中扮演积极角色。从这个意义上说,80年代的中国外交大致奠定了后冷战时代中国外交的基础。

从历史过程看,80年代的中国外交在时间上是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极“左”外交相连接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政治路线要巩固和发展,就必须要在各个领域拨乱反正,这个时期在对外政策领域也必须要清除极“左”思想的影响,新的对外政策才有可能逐步形成和发展。既然如此,就有必要梳理和厘清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中国决策层认识世界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的一些基本概念。无论当时的诸多政治观念、概念及阐述国际事务的政治术语等在今天看来是多么的陌生或不可思议,它们毕竟是那个时期开始清算极“左”外交和重新认识国际事务和探讨对外政策的出发点,其中不少东西至今还有影响。

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为开端,中国的对外政策也必须开始进行根本性的调整。客观上说,中国对外政策如果要适应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大战略的转变,就必须根本否定上述已经形成并可称为是根深蒂固的极“左”外交的框架。进一步说,对极“左”外交思想的根本否定,也是中国发展战略本身得以确立和不断巩固的基本条件。

从后来不断进行的有关探讨和争论看,对极“左”外交思维的否定经历了相当长的过程。透过这个过程中反复出现的热烈争论,可以看到,那些纷繁复杂的观点总的说来是围绕以上四个根本性的问题展开的。

首先是开始逐步摆脱在“时代”问题上所受的传统理论的影响和束缚。根据中国领导人战略思维的基本逻辑,在建国后历次研究和确定国家大战略的过程中,都必须就世界政治的基本特征、国际政治力量的基本分野和它们之间的力量对比、国际形势的主要发展趋势等等,作出基本的判断。这种判断具体到国家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领域,就是必须确定爆发世界战争和大规模外敌入侵的可能性的的大小,即必须确定是否存在保持较长时期的国际和平环境的可能性。概括来说,中共中央将进行

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作为中心工作并为此实行改革开放政策,首先就要解决是否具备基本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的问题。

人的认识在其发展的任何阶段上,都不可能摆脱历史的影响,再现历史的某些有价值的部分本身就是历史的进步。80年代初,中国领导人的基本判断是恢复了中共八大对国际形势的基本判断,即认为战争的因素依然存在,但是世界和平的力量超过战争的力量,争取实现一个较长时间的国际和平环境是有可能的。直到80年代中期,邓小平明确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个主题的思想。这无疑是中国领导人在认识时代问题上的一次巨大飞跃。到冷战结束时,邓小平关于“两个主题”的思想已经成为中国决策层的主流意见。由于“时代”理论的特殊地位,邓小平对“两个主题”的阐述及其影响的逐步扩大,必然给中国外交带来巨大的变化。

其次是对中国在当时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开始作出越来越符合实际情况的评价,即承认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是个大国,又是个小国,所谓大国就是人多,土地面积大。所谓小国就是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还比较穷”等等。在中共十三大的政治报告中,甚至提出这样的警告:如果不加倍努力,“我们国家和民族就可能更加落后,世界就将没有我们应有的地位”。这反映出中国领导人已经越来越清楚地看到,经济长时间落后已经造成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影响力下降,如不从根本上改变贫穷落后的状况,后果将相当严重。对中国在当时世界政治中的位置的上述认识,导致中国领导人在80年代采取越来越务实的对外政策,并在冷战突然结束时迅速提出了“善于守拙”、“不当头”、“不扛旗”等堪称明智的战略决策。邓小平的话也许最能说明这一点,他说中国“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国策”,因为“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后来的发展证明,以“韬光养晦”为核心的一系列原则,在指导中国外交走出后冷战时代初期的困境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将国家利益作为对外政策的出发点,强调国家利益在制定对外政策和处理对外关系中的首要地位,是中国对外政策思想的一个重大变化。外交为国家利益服务,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就是“为经济服务”,“为实现现代化服务”。与70年代相比,强调制定对外政策、处理国与国

关系时应该超越意识形态,成为 80 年代中国外交变革的最突出的特色。其影响之深远还在于它塑造了延续至今日的中国外交指导思想的一个基本方面。

在上述几个方面的变化的影响下,1982 年中国领导人开始提出并逐步形成和确立了“独立自主的不结盟”的外交政策,并由此决定了 80 年代中国外交的主调。这项政策的提出反映了中国领导人对冷战后国际形势的基本看法和对过去三十年外交经验的基本认识。

所谓建国后三十年的基本经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就是如何认识冷战和中国在冷战中的地位,以及如何处理与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及其各自领导的两个阵营的关系等,包括与苏联结盟和对抗、与美国对抗到实现关系正常化及与美国建交前后处理中美关系的主要经验。中国领导人显然不再打算在冷战中扮演如同过去那样的积极角色,他们希望中国能够在两极格局中争取一个超然的能够自主行动的地位。正是根据这个指导思想,1982 年中共十二大以后,中国在维持与美国的战略关系的同时,开始探索改善与苏联的关系,直到 1989 年实现了中苏关系正常化。在冷战结束时,中国同世界主要国家均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关系,特别是在美苏两国之间取得了相对平衡的地位。换句话说,美国和苏联及其各自领导的阵营发生任何变化,都难以对中国的内外政策产生根本性的影响。

围绕上述变化展开的争论及其结果,对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对外关系的影响是巨大的。到冷战结束时,中国外交已经走上“无敌国”的轨道。中国不再参与冷战中的两极对抗,是中国后来能够相对稳妥地应对冷战结束后急剧变化的国际环境的关键性原因。它使中国能够站在一个相对主动的地位上,比较从容地应对冷战后时代国际格局的大变动,并克服外交方面的种种困难,为国家的发展战略创造了相当有利的外部环境。至于中国外交在后冷战时代的变化和发展,这本书已经作了比较充分的阐述。

全书共十章,从回顾 20 世纪的中国外交开始,到设计 21 世纪初的中国外交战略结束,比较系统全面地论述了后冷战时代中国外交的各个方面,包括中国全面融入现代国际体系的过程、中国与各主要大国的关

系、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以及中国对周边地区的政策等等。第一章的作者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章百家,第二章的作者是外交学院教授张清敏,第三章的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陶文钊,第四章的作者是美国文博大学政治学教授于滨,第五章的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吴白乙,第六章的作者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梁云祥,第七章的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蓝建学,第八章的作者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杨宝筠,第九章的作者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张植荣,第十章的作者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叶自成。另外在成书过程中,马荣久、杨光等给予了隆尧的协助,在此表示感谢。由于是集体合作完成的,书中一些章的内容难免有一些重复,各章的文字风格也未做到统一,在此恳请读者谅解。

牛 军

目 录

第一章 20 世纪中国外交的历史回顾	/ 1
第一节 近代中国外交的起源与困境(1840—1911)	/ 2
第二节 民国初年外交失败的后果(1911—1927)	/ 6
第三节 国际体系的大变动与中华民族的独立 (1927—1949)	/ 11
第四节 革命的中国与美苏冷战的碰撞(1949—1978)	/ 17
第五节 改革开放、面向未来的中国外交(1978—2000)	/ 26
第六节 历史的经验	/ 30
第二章 总体外交与全面融入国际体系	/ 35
第一节 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的历史和国际环境	/ 36
第二节 全面参与联合国机制,发挥建设性作用	/ 42
第三节 大国自信增强,多边外交活跃	/ 48
第四节 适应经济全球化,拓展经济外交	/ 63
第五节 主张国际社会多元化,推动文化外交	/ 73
第六节 适应全球化,提倡和实践人本外交	/ 85
第七节 总体外交的特点及分析	/ 95
第三章 后冷战时代的中美关系	/ 111
第一节 防止中美关系的滑坡	/ 113
第二节 艰难的磨合	/ 122
第三节 风雨中的稳定和发展	/ 132
第四节 发展建设性合作关系	/ 142

第四章 后冷战时期的中俄关系	/ 150
第一节 历史的沉重脚步	/ 151
第二节 打破坚冰	/ 154
第三节 “后苏联”时期的中俄关系： 从“存异”到“求同”	/ 163
第四节 普京时代：中俄关系“再正常化” (2000—2005)	/ 173
第五节 “正常关系”的挑战与机遇	/ 192
第五章 后冷战时代的中国与欧洲	/ 193
第一节 中欧关系演进的国际背景	/ 194
第二节 中欧自身的变化及其外交演进	/ 207
第三节 中欧关系发展的动力与问题	/ 221
第四节 结语	/ 237
第六章 后冷战时代的中国与日本	/ 240
第一节 中国的经济大国化与日本的政治大国化	/ 241
第二节 台湾海峡危机与日美安全保障体制 的强化	/ 251
第三节 冲突与合作并存的中日关系	/ 260
第七章 后冷战时代的中国与印度	/ 273
第一节 冷战的终结与中印关系“正常化”	/ 274
第二节 中印关系“正常化”的主要障碍	/ 276
第三节 中国的对印政策	/ 282
第四节 印度的对华战略	/ 294
第五节 中印相互战略的比较分析：和谐与 不和谐	/ 302

第八章 后冷战时代的中国与发展中国家	/ 306
第一节 历史的回顾	/ 307
第二节 冷战结束后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	/ 311
第三节 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全面发展	/ 318
第四节 面向未来的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	/ 339
第九章 后冷战时代的睦邻外交政策	/ 343
第一节 历史的遗产	/ 344
第二节 后冷战时期中国的周边外交	/ 352
第三节 中国睦邻周边外交的成就与特色	/ 358
第十章 21 世纪初中国外交战略的选择	/ 369
第一节 邓小平外交战略思想的坚持与继承	/ 369
第二节 21 世纪初中国外交战略的新选择	/ 376
第三节 21 世纪初中国外交战略的几点思考	/ 389

第一章

20世纪中国外交的历史回顾

在过去不久的20世纪,无论中国所面对的国际环境还是中国自身,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两方面变化都对中国外交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随着思想和学术的解放,中外关系史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众多新成果的出现不仅使人们对中外关系演进的关键环节有了比以往更细致、更准确的了解,而且有可能在更高层次上进行综合研究,宏观把握20世纪中国外交的总体进程。

站在21世纪回顾过去一百多年的中国外交,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两条比较清楚的线索。其一是中国外交是在两个层次的互动中发展的,即国际环境和中国外交之间存在的互动,以及中国外交与中国内政之间的相互影响。外交任务与中国所面临的更为基本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任务之间的联系,往往在更深层次上决定着中国外交的走向,体现着内因和外因之间长期的互动关系。

其二是20世纪初期和中期,国际体系的两次

大变动和中国国内不同性质政权的更替几乎同时发生,造成了中国外交发展过程的明显断裂。但是,前一历史阶段形成的外交遗产对以后发展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在表层断裂之下,隐藏着中国外交发展的连续性。正是这种连续性中蕴含着一些带有规律性的内容,蕴含着支配中国外交发展的,由地缘、历史、文化和民族发展目标等因素决定的,更基本、更持久的国家利益。

因此,考察和理解任何一个历史时期——不论是过去、现在,甚至是未来——的中国外交,都必须首先把它放入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全过程之中,必须注意国际环境变迁、国内政治变革与中国外交演进三者之间的交互作用。应该关注的不仅是历史链条上的那些事件和环节在彼时彼地所起的作用,而且包括它们对中国人的外交观念的形成、对中国外交发展的长远影响,并由此总结和概括出 20 世纪中国与世界相互关系的基本特点和经验。

第一节 近代中国外交的起源 与困境(1840—1911)

在中华民族有文字记载的几千年历史上,大概没有哪个世纪的开端像 20 世纪这样使中国人蒙受耻辱。1900 年,为镇压义和团起义,由英、美、日、俄、德、法、奥、意组成的八国联军占领了中国的都城北京。尽管十一年之后,清王朝就在辛亥革命中被推翻了,但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中国都未能从清末形成的外交困境中摆脱出来。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外交是在一个传统的中国与已经进入了资本主义的西方世界发生全面冲突的过程中产生出来的。中国外交的困境就与它起源的这个历史环境密不可分。

事实上,直到 19 世纪中叶,中国与任何国家还不存在今天人们所理解的那种主权国家间的外交关系。中国人虽然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代就创造并使用了“外交”这一词汇,但这个词最初的几个含义都与现

代的“外交”一词风马牛不相及。唯一沾点边的意思是“人臣私见诸侯”^①，按现在的话说，就是“里通外国”。这大约是直至清末人们仍不愿使用“外交”一词的缘故。而即便是使用了“洋务”、“夷务”之类避嫌的词，那些负责处理对外事务的官员们也大都逃脱不了“事鬼”和“卖国贼”的骂名。

如果不拘泥于词义的辨析，可以说中国的外交活动自战国时代就堪称发达。每当中国陷于分裂之时，其内部各“国”之间的交往在形式和策略思想上与现代外交不乏相似之处，最具代表性的是“三国”时代的魏、蜀、吴关系。但是，这种“外交”的终极目的却在于寻求华夏文明的再度统一。所以，在本质上，把它看做是一种“内交”，看做是为寻求统一而运用的一种手段或谋略，要远比把它看做是现代外交的类似物来得恰当。这种“外交”传统的存在或许有助于说明，为什么进入近代世界之后，中国人很快就能掌握现代外交的一些技巧，却迟迟不能领悟现代外交的真谛。

在自己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上，古代中国人遵从的一个信条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种大一统的“天下”观实际是只知有王权，不知有国权。在处理对外事务和国与国关系的时候，古代中国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宗藩和纳贡制度。它的主要特点是，中国周边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承认中国皇帝的权威，接受中国皇帝的册封，定期向中国皇帝朝贡，并接受中国的保护。这一制度是统治中国的“天子”对内至高无上的权威在对外方面的一种自然伸延。它的核心是王权之间的主从关系。在西方人看来，这种制度典型地体现出中国人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观念。不过，这一看法却很难得到中国人的认同。因为，事实上，古代中国人对中国以外的世界是怎样的几乎毫不关心，没有谁费心去构想所谓的“世界秩序”问题。在外部世界看来存在着的“中国中心观”，对中国人自己来说，则始终是一种若明若暗的意识。它渗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就像一张无形的网，因其无形而难以被察觉、被认识，因而也就难以冲决。

^① 《词源》（一），商务印书馆 1984 年版，第 650 页。